

嚴壽澂 撰

百年中國學術表微

經學編

陳永正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嚴壽澂 撰

百年中國學術表微 · 經學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百年中國學術表微·經學編/嚴壽澂著.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17-9440-1

I. ①百… II. ①嚴… III. ①學術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國 ②經學—歷史—研究—中國 IV. ①B2②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2)第057121號

百年中國學術表微·經學編

著 者 嚴壽澂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龐 堅
裝幀設計 勞 勅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13.875
字 數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17-9440-1/I · 890
定 價 50.00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序 言

百餘年來，西力東侵，中國文化隨之丕變，每下而愈況。學界中人，大多以西人之見爲準繩，對舊有的種種，批判指責，幾乎不遺餘力。綿延二千年之經學，自亦難以外。民國以來新學術體制下的主流一派，認爲經學對於社會人生，已無意義之可言。即便是治經學者，亦視之爲已陳的芻狗，只堪陳列於博物館中，供後人憑吊。以彼等之見，所謂治經，不過考訂而已，於是非熱衷於辨僞，即埋首於訓詁。另有一派，則以取自西方某家的新說衡量中國過去的一切，所作經學研究，既無舊時經師的博通，又乏新式考訂家之細密，於注疏家之說乃至經書本身，人之未深，即先行撻伐，必欲將前人看重之物掃除淨盡而後快。總之，凡中國舊說，與西方思想或理論不合者，一概看成無價值，乃兩派之所同（不同家數者，其奉爲圭臬的西說固自不同，但就宗奉西說而言，則二者無異）。

然而另有一羣學者，不隨時俗風尚而轉移，不爲時髦學說所左右，努力從經學中

發掘意義，唐文治（蔚芝）與馬一浮即爲其例。民國九年，蔚芝建國學專修館於無錫，所訂學規明確說道，「吾館所講經學，不尚考據瑣碎之末，惟在攬其宏綱，抉其大義，以爲修己治人之務」。又大聲疾呼道：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則先讀經。可見其所謂經學，既非乾嘉之學，更非新式的所謂科學考證，而是做人與爲政的宏綱大義。故其講經，一以大義爲主，並以之貫通於政治、外交諸學。馬一浮則明確抉出「經術」二字，以爲「守文而傳義」乃是「經學」，「明其道，足以易天下」如孟子者，「方足以當經術」。倭寇內犯，一浮避地西蜀，創設復性書院，以六藝教諸生。以爲六藝可賅一切學術，西學亦在其內。六藝之文即是經，經爲常道，出於性分之自然，歷萬世、遍九垓而不易。人人明此義理，全其性分，世道國運庶幾有瘳。是爲一浮講學的宗旨。同時須知，唐、馬二人決非抱殘守缺、盲目排外之輩。蔚芝研究外交，自學俄文，提倡西方的科學與工藝，辦交通大學，培養大批優秀人才，儼然中國現代工科教育的先驅。一浮早年，於西方的哲學、文學、歷史諸科皆涉獵不淺，自言初治考據，繼攻西學，又轉治佛典，最後始歸於六經。可見二人之提倡經學，以經術爲依歸，並非出於頑固守舊之見，而是從自身閱歷及深刻思考而來。在二人的心目

中，經籍具有普世價值，絕不僅是國粹。

年輩稍後於唐蔚芝的張爾田（孟劬），亦不滿於乾嘉考據，而承章實齋（學誠）之緒，考鏡六藝諸子的學術流別，成《史微》內篇八卷，打通經、史之界，以爲孔子以前，諸子未分，一切學術皆統於史，其學爲六藝，其書即是六經。故曰：「六藝皆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支與流裔。」此所謂史，乃史官，非史冊。古時各官皆有史，史之大宗則是太史，所講求的是所謂君人南面之術。東周以降，「天子失官，百家始分」，流而爲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太史則降而爲道家。孔子憫羣言之紛然淆亂，乃以司徒之官而上承太史之統，六藝遂歸於孔氏，傳之弟子，儒家由此成立。然而孔子本人則是兼儒、道二家之統，故後世儒家之學實不足以盡孔子。欲明道術之全，百家不可偏廢。爲學不當拘於虛，但又不可無宗旨，而堅持自己宗旨的同時，又不可抹殺他家的異量之美。此即「博觀」與「祇異」的相輔相成。學術如此，政治亦然。百餘年前的焦循（里堂），主張「旁通」，反對「執一」，大可名之爲儒家的多元主義者。孟劬的見解，與此頗可相通。

抗戰軍興，孜孜於文字訓詁的樸學之人，亦多有轉向經世學術者，楊樹達（遇夫）

即爲一例。遇夫自恨不能執戈衛國，乃著書發揮《春秋》大義，以《榮復讎》、《攘夷》二篇爲首，以作起民族抗敵之氣。同時又堅持儒家仁義之說，以爲國家利益之上，尚有不可違背的正義。故雖倡復讎，與現代歐洲「復讎主義者」(revanchist)的主張，貌似而實不同，認爲復讎絕不是一味報復，更不是斬盡殺絕，而是應當如春秋時齊之於紀，即使有九世之讎，仍當秉持禮義。更指出《春秋》所謂夷夏之辨，全以行事爲準，依於道德而不依於種族。強調這一判斷標準是普世的，非相對主義的。普世價值以仁義爲依歸，強調是非善惡之公，此乃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義。儒家由親親之情推而廣之，由家庭至於國家，及於全人類，最後進至大同之境。由此可見，即使在抗戰艱苦之際，純粹學者如遇夫者，仍一秉儒家理念，與近世國族主義者畢竟有異。

今古文之爭，爲近世經學一大葛藤。呂思勉（誠之）、蒙文通二人，雖受傳統的經史教育，對現代的思想學術卻有相當的了解與汲取。二人與經今文學，皆有淵源，但是並不視今文爲神聖，而是用歷史的眼光對之作審視；二人所見各異，但均有堅實的史料作依據。誠之論經學，揭示四項要義：（一）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然不能謂其物不本於古。（二）傳、說、記三者，與經相輔而行；孔門大

義則存於此三者，不存於經。（三）古代事實與改制者之理想，今、古文皆有之。欲考見孔子學說之真相者，當以今文家言為主，欲考見古代之事實者，則今、古文皆有價值，然今文之價值畢竟大於古文。（四）治經不當以分別今、古文為已足，更當進而鑑定今文家之書，分別其孰為鈔錄古書，孰為孔子及孔門後學者所自撰。可見其治學，從大處落墨，目光如炬。

文通受業於井研廖平（季平），以古史與經學研究知名於時。自言其治學的特色是「以虛帶實」（然而不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官方主流史學所謂以論帶史），亦即講明事實背後的道理，旨在經世致用。因而承乃師之說而更進一步，別開新境。要而言之，約有三端。（一）上古中國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漢三方民族的不同，周秦學術因之而判分。（二）兩漢經學不同於周秦儒學，一為經生之學，一為儒士之業。（三）秦漢之際新儒家最為卓越，立新法，創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貴賤貧富之懸絕，欲一舉而夷平之，非孔、孟「從周」之見所能範圍。然而揆之以孔孟「為兆民」之意，則可說是一脈相承。可見其中心所嚮往者，正是儒家所謂大同之境，與撰有《大同釋義》的呂誠之，可謂桴鼓相應。

年輩較早的陳鼎忠（天倪），隱然以當代鄭康成（玄）自許，揭出信古、尊經、述聖三要義，於近人疑古辨偽之風，深惡痛絕，以爲《周官》乃周公所作，古文《尚書》非偽，諸子百家皆出於古王官之學，六經則是王官學的總匯，爲中國學術之源，豈可不尊。孔子之於六經，只是刊定訓釋，不在其位，不敢改制，所以是「述而不作」。然而在傳述之外，又闡發大義，故述即是作。認爲治經所重，在通學而不在家法，故古文勝於今文。鄭君之外，於孔穎達亦特加推重。認爲中唐以後，說經之作可取者少；宋人變古，經學更爲荒落，遞演遞衰，至晚明而極。清儒復古，經學大明，厥功至偉。又深信學術與國勢互爲因果，因此看重「儒效」。認爲儒效之最顯著者，在「納民於軌物」之禮，此乃所謂治本。儒效之大成，則在合天下爲一家，進小康於大同。信古的陳天倪，與疑古的康長素（有爲），在此是殊途而同歸了。可見學術思想之事，本多弔詭也。

英年早逝的近世奇才劉咸炘（鑑泉），治學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校讎入手，雅近章實齋而更爲深入。指出古時學在官府，其書爲六經，其學即六藝。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其道術即蘊含於所記載的六類實事即六經之中，所以說「六經皆史」；此

乃六經本體。孔子始以六藝授徒，於是官學變爲私學，六藝流爲諸子，孔子遂爲儒家之祖。而六藝本是史官所執掌，史官則流而爲道家。孔子以私家身分而傳授古人道術之全，因此是儒家而兼道家。當時經學中古文一派，以爲六經惟是記事，孔子僅「整齊故事」而已；今文一派則以爲六經是孔子自撰，其中所記載的古事，都是孔子假託的寓言。鑑泉指出，一派視六經爲陳年舊賬，一派則是以欺天下後世爲孔子頌，二者致誤的原因，在於不明六經本體。更須知孔子傳經，目的在於教人學做人，所以治經實是爲己之學。以此爲準而論羣經之學，於是別有一番見地。

錢穆（賓四）任教於北京大學多年，其《國史大綱》一書，風行一時，就社會知名度而言，大概較上述諸人爲高。然而論學論治，皆不隨時俗，不傍門戶，直抒所見。今人往往將其歸入頑固守舊一類，然而其治學，其實極爲大膽，極富創見。其論經學，亦甚爲廉悍，與當時任何一家均大有差異。以爲所謂六藝，本是東周以前統於王官的學術。周室東遷，王官學衰而私家言起，開其先者爲孔子。孔子以王官學教於民間，儒家由此興起。《春秋》則是孔子本人依據魯史而作，以當後王之法。漢代人之尊孔子，尊此也。依漢代人的看法，學術有新舊兩大類：孔子以前是舊學，孔子以

後，百家興起，是爲新學。武帝以後，「舊學」式微，爲漢立制的「新學」成了新興的官學，即漢代經學，漸開祿利之途。此途一開，便有制科射策。漢儒因此重章句，以便教學，於是而有師法，師法亦即家法。另有一類學者，不樂於守章句，遵師法，而以兼通爲尚，故多明訓詁大義，當時稱之爲古學；守章句師法者，則爲今學。東漢經學所謂今古之分，即指今學古學，其時並無今文、古文之異。今、古學之別，則有兩重意義：一是「今學守家法，古學尚兼通」，二是「今學務趨時，古學貴守真」。以今文、古文分別經學之誤，實起於後世，至晚清而益甚。簡言之，「孔子以前未嘗有六經，孔子亦未嘗造六經。言孔子者，固不必專一注重於後世之所謂六經也」。所謂經學，「只指對於中國古代相傳幾部經書之特有研究而言」。兩漢時代的經學，有一絕大貢獻，即是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文治政府的傳統。其所體現的，正是儒家的經世精神。賓四因此認爲：專注於訓詁考證的清代漢學，缺少了儒家經世的精神，故無靈魂，非真經學；將儒家僅視爲一種哲學的現代新儒家，忽視了向來的經學傳統（亦即偏離了上承歷史的古代王官學傳統），故無骨骼，亦非真經學。宋代新儒家，旨在重新發揚古代儒家的人生态想，使之再與政治理想會通，此乃真儒學。有此真儒學，便有了以四

書爲主的新經學。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傳統，尚有百家衆流，非儒學所能限；然而就整體而言，中心畢竟是在儒家。總之，以賓四之見，古代王官學重傳承，諸子百家則貴創新；孔子開啓的儒家，綰合政、教，融通經、史，既重傳承，又貴創新，所以爲大。其論學之歸宿，其在於斯乎。

本書對以上諸家，不存預設之見，盡量就其著作本身作深入的探討，旨在抉隱表微，發潛德之幽光。今日或後世的學界，若能有取於斯，是爲至願。

拙作承黃君曙輝謀畫出版事宜，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惠予刊行，又承華寶齋蔣山、張金鴻二君出資付梓，銘感於心，謹表謝忱。蒙陳沚齋先生不棄，爲本書題簽，在此一併致謝。

目 錄

經術與救國淑世——唐蔚芝與馬一浮

一、引言	一
二、唐蔚芝經術觀述略	七
三、馬一浮經術觀述略	二十四
四、餘論	三八
五、後案	一五四
六、結語	九九
七、《史微》要旨表註	五九
一、六藝諸子統於史	五九
二、孔子與史統	六六
三、經今古文之辨	七一
四、治經之道	七八
五、諸子與六藝	八七
六、結語	八七

「信古天倪」——陳鼎忠治經要義詮說

一、序說	一〇九
二、尊經信古	一一二
三、辨章學術	一二五
四、儒效引義	一四九
五、後案	一五四
六、六經與孔門	一六七
七、今古文之辨	一七八
八、五經各論	一八七
九、後案	二〇六

讀楊樹達《春秋大義述》

一、序說	二一七
二、樸學家經世之作	二二二
三、夷夏之辨非國族主義	二二六
四、愛國、重民與仁義法	二三四
五、儒家政治思想根本義：是非 善惡之公	二四三
六、正己與禮讓	二四七
七、正變與權	二五三
八、親親與天下爲公	二五六
九、餘論：仁心不容已與大同境界	二六〇
經通於史而經非史——蒙文通經學研究述評	
一、敍說：爲學宗旨及前後三變	二六九
二、文化三系與周秦學術	二七八

王官學、私家言與歷史大傳統——錢賓四經學觀指要

一、古代學術分野：王官學與私家言	三三九
二、孔子與《春秋》	三五一
三、經學今古文之辨	三五九
四、經學、儒學與歷史大傳統	三六八
五、餘論	三七七
劉咸炘經學觀述略	
一、認識六經本體	三八七
二、統合經、子與儒、道	三九四
三、經今、古文學論衡	四〇三
四、治經要略	四一三

經術與救國淑世——唐蔚芝與馬一浮

一、引言

清末民初以降，卑經、廢經之論不絕。其時學術界最佔勢力的有兩派，其一是以章太炎爲代表的國粹派。太炎有《與某論樸學報書》，作於清末，中云：「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於輓近？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朽蠹粗劣，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①易言之，經學祇有歷史的意義（「所以存古」，猶如商盤周鼎，可置於博物館，以興起後世子孫仰視先人之心），而無現實的意義（非可「以是適今」，亦即於今世事務全無應用價值）。另一派是受新思潮熏習的學者，可以周予同爲例。民國十七年，周氏註釋皮錫瑞《經學歷史》，在序言中說道，對於孔子和經學，「我原是贊成『打倒』和『廢棄』的，但我自以爲是站在歷史的研究上的。我覺得歷史派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的客觀、比

較的公平；從歷史人手，那孔子的思想和經學一些材料不適合現代的中國，自然而然地呈獻在我們的眼前。」認為「現在就是研究經學，也只能採取歷史的方法，而決不能含有些微的漢儒「致用」的觀念」。^②

太倉唐蔚芝（文治）際此時會，力抗潮流，提倡讀經，不遺餘力，「爰搜羅十三經善本及文法評點之書」，「自宋謝疊山先生至國朝曾文正止，凡二十餘家」。其友人施省之（紹曾）「聞有此書，商請付梓」。^③民國十年，蔚芝作《施刻十三經序》，謂今世「學說之詖淫」，「士林之盲從」，「閭閻之痛苦而無所控訴」，「世界之劫運若巨舟泛汪洋而靡所止屆」，正是「人心之害爲之」；人心之害所以如此，乃起於廢經，「廢經而仁義塞，廢經而禮法乖，廢經而孝悌廉恥亡，人且無異於禽獸」。^④因此，「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讀經；欲讀經，先知經之所以爲經」。^⑤經乃載道之物，故曰：「傳經所以傳道也。」欲讀經有益，把握經中所言之道，切不可「鑿之使晦」，「歧之而高」，^⑥須明其大義。蔚芝於是著手撰寫《十三經提綱》，「附於諸經簡末」；爲求讀者易於了解文義，又集前人評點，自明人鍾（惺）、孫（鑛），以逮清人方（苞）、劉（大櫆）、姚（鼐）、曾（國藩）諸名家，「參以五色之筆，閱十數年而成書」。^⑦用心可謂

良苦。施省之「勇於爲善，志在淑人」，與蔚芝同調。於民國九年，倡建國學專修館於無錫，託蔚芝主其事。蔚芝爲訂立學規，以「振起國學，修道立教」爲宗旨。規章共十項，即：躬行、孝弟、辨義、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挽救世風。「經學」項謂「吾國十三經」乃是「國寶」，「吾館所講經學，不尚考據瑣碎之末，惟在攬其宏綱，抉其大義，以爲修己治人之務」。^⑧亦即通經正所以致用，故治經所尚，不在「存古」，而在「適今」。如此論調，與上述章太炎之見，可謂截然異趣。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遼瀋陷於倭人，蔚芝蒿目時艱，作《廢孔爲亡國之兆論》，^⑨曰：「今天下亡國之聲洋洋盈耳，雖三尺童子亦知不免於國難，莫知其所以然之由，而亦莫思所以挽救之者。此真大惑不解者也。吾特斷之曰：『廢孔則國必亡，尊孔則國可以不亡。』兩言而決耳。」其理由是：「道德爲立國之本，道德既喪，國本撥矣。文化者，國寶也。我中國數千年之文化，皆賴孔子爲之祖述而憲章，爲之繼往而開來，爲之發揚而光大。今一旦墜地無餘，國寶裂矣。」^⑩作於民國二十七年的《孟子尊孔學題辭》對此更作申述，云：「人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爲人；國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立國。我國之重心維何？尊孔是矣。」中國往日